

南西伯利亞與蒙古國匈奴 考古中所見的伊朗及 西方文化元素*

陳健文**

摘要

匈奴由於其在早期中國史上的重要地位，歷來常被視為是一個只與中國歷史相關的民族。然而早在二十世紀初期所挖掘的諾彥烏拉匈奴王族墓葬中，已出土了不少帶有伊朗以及西方色彩的文物，證明古匈奴人除了與中國有密切的往來外，其實同時與中亞及西方歐洲文明也有接觸的痕跡。近年來在蒙古國與俄羅斯境內的南西伯利亞地區，陸續發掘了多座重要的匈奴時期墓葬，這些墓葬中的出土物再度向學界印證了匈奴與中亞及西方文明間的聯繫關係，從這些地區所出土的匈奴貴族墓葬

* 本文寫作過程曾獲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補助（計畫編號：97-2410-H-003-138-），謹申謝忱。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中的遺物，我們可以看到中亞安息、貴霜文明與希臘羅馬文明對匈奴的影響。而小亞細亞、安息以及大夏地區的織物之所以出現在匈奴的統治地區，極有可能是透過貿易的形式，也有可能是以朝貢的形式。凡此種種的考古跡象都說明了至少自匈奴時期以來，中亞與西方的文化因素早已在蒙古高原與南西伯利亞地區流傳開來，古代匈奴與中亞及西方間的互動關係實值得學術界進一步的關注。

關鍵詞：匈奴考古、諾彥烏拉墓葬、月氏—貴霜、安息、大夏、西方文明

一、前言

匈奴由於其在早期中國史上的重要地位，歷來常被視為是一個只與中國歷史相關的民族。然而一般人較少知悉的是，從二十世紀初期所挖掘的諾彥烏拉匈奴王族墓葬中，已出土了不少帶有伊朗以及西方色彩的文物，證明古匈奴人除了與中國有密切的往來外，同時也與中亞及西方歐洲文明有接觸的痕跡。另一方面同樣是在二十世紀初，於南西伯利亞所發現的一座匈奴時期具漢代建築風格的宮殿中，亦曾發現疑為希臘森林之神薩提爾（Satyr）的鋪首，凡此都證明匈奴與西方文明間的互動超乎今人想像。近年來在蒙古國與俄羅斯境內的南西伯利亞地區，陸續發掘了多座重要的匈奴時期墓葬，這些墓葬中的出土物再度向學界印證了匈奴與中亞及西方文明間的聯繫關係。從這些地區所出土的匈奴貴族墓葬遺物，我們可以看到中亞安息（Parthia）、貴霜（Kushan）與希臘羅馬文明對匈奴的明顯影響。前述種種的考古跡象都說明了至少自匈奴時期以來，中亞與西方的文化因素早已在蒙古高原與南西伯利亞地區流傳開來，古代匈奴與中亞及西方間的互動關係實值得學術界進一步關注。

二、近年來匈奴考古的新進展

匈奴考古的發現始於十九世紀末葉與二十世紀初期，俄國學

者塔里克·格林采維奇（J. Talyko-Grinzwich）首先在外貝加爾挖掘了蘇德日尼墓地與德列斯圖伊墓地，¹不過二十世紀初期最著名的匈奴考古發現還是要屬位於蒙古國的諾彥烏拉墓地。1912 年，蒙古國的一位黃金工業技師為了尋找黃金，意外的發現了諾彥烏拉地區的匈奴墓葬。諾彥烏拉墓地位於距蒙古共和國首都烏蘭巴托市以北約 120 公里處，從二十世紀 20 年代中期開始，由發現者科茲洛夫（P. K. Kozlov）對其做出了初步的研究。²1924 年科茲洛夫正式對諾彥烏拉的匈奴墓葬群進行了調查挖掘，其遺物代表了直接或間接與匈奴相關的古代文明，包括中國、安息、花刺子模（Chorasmia）、大夏（Bactria），還有塔里木盆地的綠洲王國，此外還出土了與古埃及、羅馬相關的遺物。³自 1924 年至 1925 年科茲洛夫在此共發掘了六座大型貴族墓和四座平民墓，被視為是蒙古國境內匈奴考古學研究的開端。⁴在 1950 年代起，蒙古國的考古工作者曾繼續對匈奴遺址進行考古挖掘工作，如策·道爾吉蘇榮（C.

¹ 魯金科（S. I. Rudenko）著，孫危譯，《匈奴文化與諾彥烏拉巨冢》（北京：中華書局，2012），頁 7。

² 娜塔莉亞·博羅斯馬克（Natalia V. Polos'mak），〈諾音烏拉古冢發掘新收穫：中亞游牧人群的隱秘生活〉，文收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等主編，《第二屆世界考古論壇會志》（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頁 102。

³ 娜塔莉亞·博羅斯馬克（Natalia V. Polos'mak），〈諾音烏拉古冢發掘新收穫：中亞游牧人群的隱秘生活〉，頁 106-107。

⁴ 策·圖爾巴圖、薩仁畢力格，〈蒙古國境內匈奴墓葬研究概況及近年新發現〉，《草原文物》，2011：1（呼和浩特，2011.3），頁 66。

Dorjsuren) 即將其考古成果發表著名的《北匈奴》一書,⁵在1990年之前,蒙古國也曾與蘇聯、匈牙利等東歐國家合作進行匈奴墓的考古挖掘。⁶1990年代之後,蒙古國加速與其他國家的考古合作,陸續與法國、美國、日本及韓國合組考古隊,利用西方最新的技術對境內的匈奴墓葬進行考古發掘。⁷1990年代之後較為著名的匈奴墓葬發現有高勒毛都(Gol Mod)1號及2號匈奴貴族墓地,墓葬最大的規模達23.5公尺,是目前發現最大的匈奴貴族墓葬。2006-2009年,蒙古國又與俄羅斯合作針對諾彥烏拉的20號和31號匈奴墓地再次進行發掘,並取得豐碩的成果,甚至發現了具有

⁵ 《北匈奴》一書筆者目前未見有英譯本或中譯本,部分內容林幹曾收入其〈匈奴墓葬簡介〉與〈匈奴城鎮和廟宇遺跡〉二文,均收氏編,《匈奴史論文選集》(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375-412,413-429。不過日本學者曾將其譯成日文後以連載的方式發表,參見II ドルジスレン著、志賀和子譯,〈『北匈奴』(1)-(5)〉,《古代學研究》,117-121(大阪,1988-1990),頁1-12;20-34;26-42;20-30;45-57。

⁶ 部分成果參見普·巴·科諾瓦洛夫(P. B. Kononov)等著、陳弘法譯,《蒙古高原考古研究》(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16),頁77-166;Hayashi Toshio(林俊雄),“Agriculture and settlements in the Hsiung-nu,”《古代オリエント博物館紀要》,第6卷(東京,1984),頁51-92。

⁷ 部分成果參見白杵勲,〈モンゴルの匈奴墓〉,文收奈良国立文化財研究所創立40周年記念論文集刊行會編,《奈良国立文化財研究所創立40周年記念論文集文化財論叢II》(京都:同朋舍出版,1995),頁773-793;米尼亞耶夫(Miniaev)撰、畢波譯,〈匈奴考古〉,《新疆文物》,2003:2(烏魯木齊,2003.9),頁106-118;策·圖爾巴圖,〈蒙古地區匈奴城址研究〉,文收魏堅、呂學明主編,《東北亞古代聚落與城市考古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14),頁181-190。

古希臘文化因素的遺物。⁸

在南西伯利亞地區，1928年由索斯諾夫斯基（G. P. Sosnovsky）帶領的考古隊在貝加爾湖南岸的伊里莫瓦谷地發掘了 11 座匈奴墓葬，更重要的是在伊沃爾加河下游發現了匈奴時期的定居遺址「伊沃爾加城」（Ivolga Fortress）。二十世紀後半葉，蘇聯考古學家繼續對伊沃爾加城及伊沃爾加墓地、德列斯圖依墓地進行發掘，並在 1990 年代陸續公布了發掘材料。另外在阿爾泰圖瓦地區以及葉尼塞河中游一帶也有一些與當地土著共存但含有匈奴文化因素的遺存，但數量相對較少。⁹較晚近的重要考古發現是俄國考古隊自 1998-2005 年在布里雅特地區查拉姆（Tsaram）所發掘的匈奴貴族墓葬遺址，出土了不少與漢朝及西方相關的考古遺物，¹⁰有關上文提及之重要匈奴考古遺址位置可參考圖 1。¹¹2009 年，單月英曾將

⁸ 策·圖爾巴圖、薩仁畢力格，〈蒙古國境內匈奴墓葬研究概況及近年新發現〉，頁 66-71。

⁹ 潘玲，〈伊沃爾加城址和墓地及相關匈奴考古問題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07），頁 3-4；有關阿爾泰地區的匈奴考古參見 Yu. S. Khudyakov, “Problems of the Genesis of Culture of the Hunnic Period in the Altai Mountains,” *Ancient Civilizations from Scythia to Siberia*, 3: 2-3 (January, 1997), pp. 329-346; Yu. S. Khudyakov, “Reconstruction of Female Costume Among the Nomads of the Hun Period in the Altai Mountains,” *Ancient Civilizations from Scythia to Siberia*, 7: 1-2 (January, 2001), pp. 55-69; E. M. Murphy, *Iron Age Archaeology and Trauma from Aymyrlyg, South Siberia* (Oxford: Basingstoke Press, 2003).

¹⁰ S. S. Minyaev, “Tsaram: A Burial Ground of the Hsiung-nu Elite in Transbaikalia,” *Archaeology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of Eurasia*, 37: 2 (June, 2009), pp. 49-58.

¹¹ William. Honeychurch, “From Steppe Roads to Silk Roads: Inner Asian Nomads and Early Interregional Exchange,” in *Nomads as Agents of Cultural Change: The Mongols and Their Eurasian Predecessors*, eds. R. Amitai and M. Bira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5), p. 61.

其碩士論文發表，對晚近的匈奴考古成果作一疏理，可協助學界瞭解匈奴考古的近況。¹²2011 年，由 Ursula Brosseder 與 Bryan K. Miller 兩位年輕一代的匈奴考古新秀主編了一本匈奴考古論文集 *Xiongnu Archaeology*，¹³由德國波昂大學作為其亞洲考古專論系列（Bonn Contributions to Asian Archaeology）之第 5 冊正式出版，是英語世界近來較為重要的匈奴考古專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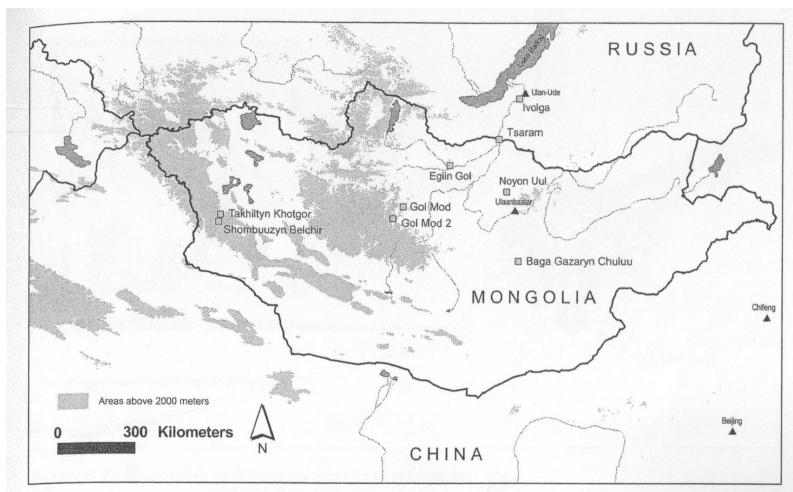


圖 1 蒙古國與南西伯利亞重要匈奴遺址分布圖

資料來源：Honeychurch, William. “From Steppe Roads to Silk Roads: Inner Asian Nomads and Early Interregional Exchange,” p. 61.

¹² 單月英，〈匈奴墓葬研究〉，《考古學報》，2009：1（北京，2009.1），頁35-68；稍早馮恩學也曾在其專著中介紹過西伯利亞的匈奴考古概況，參見氏著，《俄國東西伯利亞與遠東考古》（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2002），頁459-500。

¹³ Ursula Brosseder & Bryan K. Miller ed., *Xiongnu Archaeology -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f the First Steppe Empire in Inner Asia* (Bonn: Vor- und Frühgeschichtliche Archäologie, Rheinische Friedrich-Wilhelms-Universität, 2011).

在匈奴墓所出土的考古遺物中，來自漢朝的物品無疑是最豐富的，除了漢式銅鏡之外，也出土了為數不少的漢朝漆器，其中漆器上的銘文更為匈奴墓葬的斷代提供了直接的助益，在高勒毛都與查拉姆還出土了應是漢朝所贈與的帶頂傘（華蓋）馬車（輦車）。¹⁴然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漢式的遺物外，匈奴墓也出土了不少來自中亞伊朗文化甚至是具有西方希臘羅馬風格的遺物，這表明匈奴作為一個游牧民族，其貿易與政治活動的範圍是大大超出以往傳統的認知之外。除此之外，匈奴研究中至今仍聚訟不已的一個傳統議題——匈奴的人種問題，也是充滿爭議性的一個討論焦點，雖然有很多學者都主張匈奴的人種是蒙古人種，而且與現今的蒙古人具有血緣上的承襲關係，¹⁵但匈奴墓葬中仍不時可見到具有歐羅巴人種特徵的遺骸，匈奴起源的過程中是否有歐羅巴人種的族群（如斯基泰——塞人 Scythian-Saka）參與其中？¹⁶也是相當值得留意的一個面向。以下本文將針對匈奴墓葬中所出土具有的中亞伊朗及西方希臘羅馬的文物來做一介紹，並從歷史學的觀點來重新審視匈奴與月氏——貴霜間的互動關係。

¹⁴ 安緯（Guilhem André）、奚芷芳（Holotová-Szinek Juliana），〈蒙古匈奴貴族墓地初步研究〉，《考古學報》，2009：1（北京，2009.1），頁81-84。

¹⁵ 雪蓮，〈匈奴考古研究在蒙古國——以20世紀匈奴考古為例〉，《西部蒙古論壇》，2011：3（烏魯木齊，2011.8），頁62-63。

¹⁶ Alexander Savelyev and Choongwon Jeong, "Early nomads of the Eastern Steppe and their tentative connections in the West," *Evolutionary Human Sciences* 2, e20 (May, 2020), pp. 1-17.

三、匈奴考古中所見的中亞伊朗元素

在蒙古國的匈奴墓葬考古中，早在二十世紀初科茲洛夫的發掘即已發現了疑似來自中亞大夏地區的刺繡織物。在科茲洛夫所發掘的諾彥烏拉 6 號及 25 號墓葬中，出土了一些帶有中亞大夏風格人像的織物，這些織物被稱為「希臘—大夏（Greco-Bactria）」式的織物。¹⁷從織物的特徵來看，Perceval Yetts 認為這些織物極可能是出自作坊位於小亞細亞的希臘工匠，或是黑海克里米亞地區的 Panticapaeum（Kerch），¹⁸然 Camilla Trever 反對織物是來自近東的希臘人殖民地，而主張應是來自受希臘化文化所影響的大夏或安息上層貴族。¹⁹

魯金科（S. I. Rudenko）亦認為其中一件毛織帷幔上繡的花紋具有希臘—大夏風格，另外上面繪製的兩幅肖像也具有同樣的特點，諾彥烏拉巨冢中出土的掛毯類織物裡還有來自安息或是小亞地區的，²⁰因此可能在匈奴單于的幕營中，或有來自大夏、安息的男女工匠。²¹不過 Herwin Schaefer 卻認為這些織物是漢朝透過西域

¹⁷ 魯金科（S. I. Rudenko）著，孫危譯，《匈奴文化與諾彥烏拉巨冢》，頁122。

¹⁸ W. Perceval Yetts, "Links between Ancient China and the West," *Geographical Review* 16: 4 (October, 1926), p. 620.

¹⁹ Camilla Trever, *Excavations in Northern Mongolia (1924-1925)* (Leningrad: J. Fedorov Printing House, 1932), p. 13.

²⁰ 魯金科（S. I. Rudenko）著，孫危譯，《匈奴文化與諾彥烏拉巨冢》，頁115。

²¹ S. I. Rudenko 著，加藤九祚譯，〈匈奴と他の諸民族の關係〉，《季刊ユーラシア》，3（東京，1971.12），頁40。

貿易從敘利亞獲得後，再轉贈給匈奴的，²²織物上所有裝飾紋樣都能在西元前一千紀後半期的希臘和波斯藝術中找到相似的內容。譬如在諾彥烏拉25號墓葬中所出土的兩幅刺繡人像（圖2），²³魯金科指出從其身著的服裝和所戴的頭飾來看，他們應屬典型的伊朗人，而第一幅肖像畫從人種來看，這個男性應該更接近於圖蘭人（Turanians）。²⁴這種人主要生活在中亞地區，另外波斯地區也有分布。特列維爾（Camilla Trever）表明這幅頭像表現的是一個生活在中亞地區民族的男性，而且這個民族還與在中亞地區的希臘化文明有著密切的聯繫，其中就包括希臘一大夏王國（Greco-Bactrian Kingdom）。特列維爾認為這些物品來自於希臘一大夏地區，而巴羅夫卡（G. I. Borovka）則根據騎手的形象認為這些物品是黑海沿岸的希臘移民製造的，這些希臘移民還和當地的斯基泰部落間存在著聯繫，從這些物品中可以看到希臘工匠塑造的斯基

²² Herwin Schaefer, "Hellenistic Textiles in Northern Mongolia," *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47: 3 (July - September, 1943), pp. 276-277.

²³ 梅原末治，《蒙古ノイン・ウラ發見の遺物》（京都：便利堂，1960），圖版2；魯金科（S. I. Rudenko）著，孫危譯，《匈奴文化與諾彥烏拉巨冢》，頁228，圖版60；Gelegdorj Eregzen ed., *Treasures of the Xiongnu* (Ulaanbaatar: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Mongolian Academy of sciences, 2011), fig. 385.

²⁴ 按所謂的「圖蘭人種」也稱為南西伯利亞人種類型，是一種高加索種與蒙古人種混雜的人種類型，參見角田文衛編，《世界考古學大系・第9卷 北方ユーラシア・中央アジア》（東京：平凡社，1963年），頁9；韓康信，〈塞、烏孫、匈奴和突厥之種族人類學特徵〉，《西域研究》，1992：2（烏魯木齊，1992.6），頁5。

泰戰士形象。²⁵E. D. Philips 持同樣意見，他認為這些毛氈上的騎士像是出自希臘或西亞工匠，透過伊朗而輸出到匈奴，所描繪的其實是斯基泰人。²⁶但也有學者指出從刺繡人像頭髮髮帶與蓄髭的特徵來看，與作為貴霜王朝夏宮的卡爾查延（Khalchayan）遺址出土塑像的貴霜王族造型類似（圖3），²⁷因此可視為諾彥烏拉出土刺繡與大夏的貴霜族有重要聯繫的證據，²⁸相同的造型也見於諾彥烏拉31號墓地（圖4）²⁹與20號墓地（圖9）新出土的刺繡織物。

²⁵ 魯金科（S. I. Rudenko）著，孫危譯，《匈奴文化與諾彥烏拉巨冢》，頁123-126。

²⁶ E. D. Philips, *The Royal Hordes* (London: Thomas & Hudson, 1965), p. 117, 121；Herwin Schaefer 也有類似的意見，他認為毛氈人像像極了考古出土物中的斯基泰貴人，參見 Herwin Schaefer, “Hellenistic Textiles in Northern Mongolia,” pp. 267-369, fig. 4.

²⁷ 川崎建三，〈ノイン・ウラ古墳出土刺繡毛織考——新出資料の紹介を中心に——〉，《佛教藝術》，340（東京，2015.5），頁83，圖7。

²⁸ 川崎建三，〈ノイン・ウラ古墳出土刺繡毛織考——新出資料の紹介を中心に——〉，頁78。

²⁹ Natalia Polos'mak, Henri-Paul Francfort and Olga Tsepova, “Nouvelles découvertes de tentures polychromes brodées du début de notre ère dans les tumuli n° 20 et n° 31 de Noin-Ula (République de Mongolie),” *Arts Asiatiques* 70 (November, 2015), p. 24, fig. 39；川崎建三，〈ノイン・ウラ古墳出土刺繡毛織考——新出資料の紹介を中心に——〉，頁94-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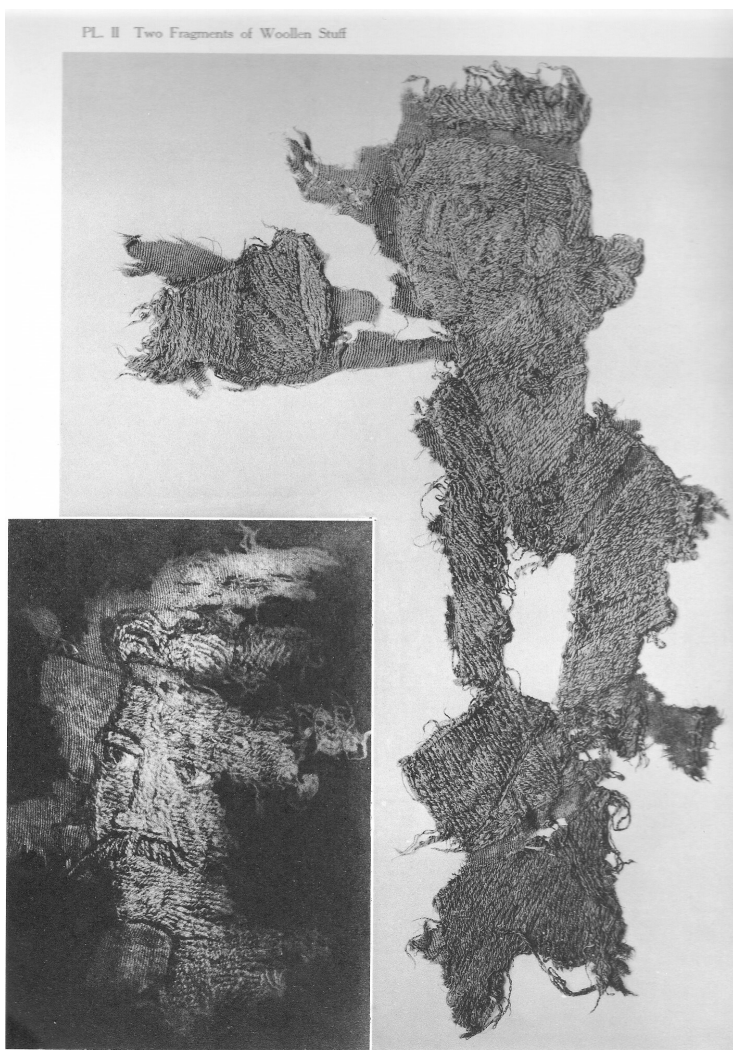




圖 2 諾彥烏拉 25 號墓葬出土的兩幅刺繡人像

資料來源：梅原未治，〈《蒙古ノイン・ウラ發見の遺物》〉，圖版 2；魯金科（S. I. Rudenko）著，孫危譯，〈《匈奴文化與諾彥烏拉巨冢》〉，頁 228，圖版 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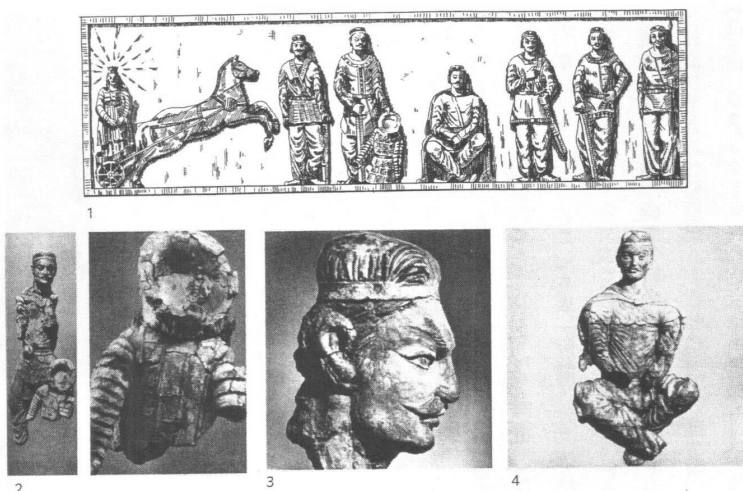


圖 3 貴霜王朝夏宮卡爾查延（Khalchayan）遺址出土的
貴霜王族浮雕與塑像

資料來源：川崎建三，〈ノイン・ウラ古墳出土刺繡毛織考——新出資料の紹介を中心に——〉，頁 83，圖 7。



圖 4 諾彥烏拉 31 號墓地新出土的刺繡織物人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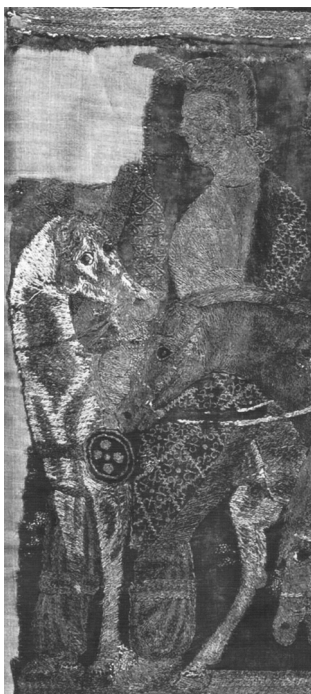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Natalia Polos'mak, Henri-Paul Francfort and Olga Tsepova, “Nouvelles découvertes de tentures polychromes brodées du début de notre ère dans les tumuli n° 20 et n° 31 de Noin-Ula (République de Mongolie),” p. 24, fig. 39。

另一幅 6 號墓葬出土織物則描繪了三個騎手（圖 5），³⁰其中第一個和第二個騎手的側面輪廓尚能看到四分之三，這兩個人均為歐羅巴人種。³¹根據騎手們髮髻和鬚鬚的特點，羅斯托夫采夫（M. Rostovtzeff）認為他們與犍陀羅的雕像非常相似。³²

³⁰ Gelegdorj Eregzen ed., *Treasures of the Xiongnu*, fig. 384.; 魯金科 (S. I. Rudenko) 著，孫危譯，《匈奴文化與諾彥烏拉巨冢》，頁 230，圖版 62。

³¹ 魯金科 (S. I. Rudenko) 著，孫危譯，《匈奴文化與諾彥烏拉巨冢》，頁 123。

³² M. Rostovtzeff, *The Animal Style in South Russia and Chin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29), p. 87.



图版六二



诺彦乌拉 M6 出土的帷幔镶边(绘有骑手的形象)

圖 5 諾彥烏拉 6 號墓葬出土的騎手織物

資料來源：Gelegdorj Eregzen ed., *Treasures of the Xiongnu*, fig. 384.；魯金科 (S. I. Rudenko) 著，孫危譯，《匈奴文化與諾彥烏拉巨冢》，頁230，圖版 62。

在進入二十一世紀後，諾彥烏拉墓地重新啟動新的考古挖掘計畫，俄國與蒙古國的聯合考古隊在 2006 年與 2009 年於 20 號墓地與 31 號墓地，又發掘出與上述二十世紀初期科茲洛夫考古發掘品風格類似的織物，³³即前文所稱的「希臘一大夏」式織物。有關

³³ 川崎建三，〈ノイン・ウラ古墳出土刺繡毛織考——新出資料の紹介を中心に——〉，頁 78。

這批織物的來源，學者間有不同的見解，有認為來自中國、敘利亞或巴勒斯坦等諸說，博羅斯馬克（Natalia V. Polos'mak）主張毛織布料是來自西亞而在印度河谷地的印度—斯基泰人手中完成加工。而雅岑科（Sergey A. Yatsenko）則從人物形象的服飾、鬍鬚等容貌特徵處著眼，力主刺繡實來自西元初期大夏地區的大月氏貴霜。³⁴至於刺繡中人物群像所顯現的容貌與衣著，博羅斯馬克覺得比較接近安息的风格特徵，然而雅岑科卻認為是大夏的大月氏族，川崎建三從刺繡中的戰鬥圖場景人像上衣的格子紋樣來看，其菱形與圓形的裝飾元素正是大月氏所流行的紋樣。³⁵

在 31 號墓葬出土的刺繡有一人物群像圖（圖 6），³⁶造型服飾與約在西元前 57 年於印度西北犍陀羅建立印度—斯基泰王國錢幣上的國王肖像造型類似。特別是右二祭壇左側人像，川崎建三認為是國王，其頭上之髮帶與後背的披風，被認為是王權的象徵。對比錢幣肖像的資料，可發現不但與貴霜朝的赫勞斯（Heraus）王肖像極為酷似（圖 7），³⁷也與卡爾查延遺址的塑像一致（圖 3）。此

³⁴ Sergey A. Yatsenko, "Yuezhi on Bactrian Embroidery from Textiles Found at Noyon uul, Mongolia," *The Silk Road*, 10 (2012), pp. 39-40.

³⁵ 川崎建三，〈ノイン・ウラ古墳出土刺繡毛織考——新出資料の紹介を中心に——〉，頁 90、93-94。

³⁶ Sergey A. Yatsenko, "Yuezhi on Bactrian Embroidery from Textiles Found at Noyon uul, Mongolia," p. 40, figs. 1-3; Natalia Polos'mak, Henri-Paul Francfort and Olga Tsepova, "Nouvelles découvertes de tentures polychromes brodées du début de notre ère dans les tumuli n° 20 et n° 31 de Noin-Ula (République de Mongolie)," p. 19, fig. 27.

³⁷ 川崎建三，〈ノイン・ウラ古墳出土刺繡毛織考——新出資料の紹介を中心に——〉，頁 83，圖 6。

外，馬腹上之障泥有類似動物腳爪毛皮的垂出物，應是承繼希臘文化的傳統，疑似是作為馬衣使用。馬尾下方繫有一垂紐，這種作法始於安息時代的初期，後來廣泛普及於安息的騎兵隊。³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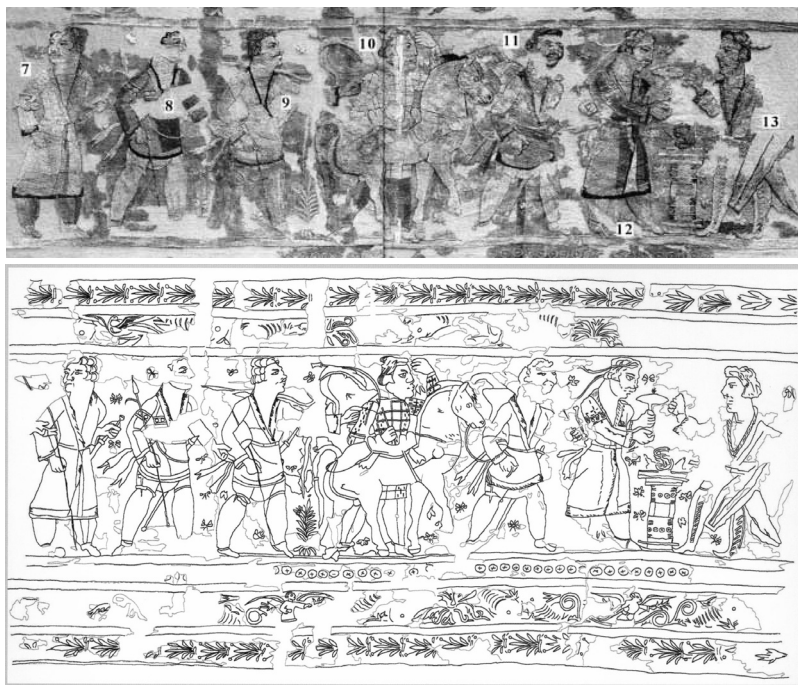


圖 6 諾彥烏拉 31 號墓葬出土人像刺繡

資料來源：Sergey A. Yatsenko, “Yuezhi on Bactrian Embroidery from Textiles Found at Noyon uul, Mongolia,” p. 40, figs. 1-3; Natalia Polos'mak, Henri-Paul Francfort and Olga Tsepova, “Nouvelles découvertes de tentures polychromes brodées du début de notre ère dans les tumuli n° 20 et n° 31 de Noin-Ula (République de Mongolie),” p. 19, fig. 27.

³⁸ 川崎建三，〈ノイン・ウラ古墳出土刺繡毛織考——新出資料の紹介を中心に——〉，頁82-83。



圖 7 貴霜朝的赫勞斯（Heraus）王錢幣肖像

資料來源：川崎建三，〈ノイン・ウラ古墳出土刺繡毛織考——新出資料の紹介を中心に——〉，頁83，圖6。

此毛織刺繡尚有一伊朗文化元素，可觀察到織錦最右端的兩名人物似正在對一火盆祭壇進行宗教儀式，博羅斯馬克稱此為「祭儀圖」。火盆祭壇上方兩側有象徵火焰的三角形記號，中間 S 形符號則象徵瑣羅亞斯德教徒拜火儀式中的供物「油」（S 形符號在煉金術中代表油）。祭壇左側的男子頭戴髮帶王冠，此種造型普遍見於自阿赫美尼德王朝至薩珊朝中亞與西亞諸王朝的錢幣國王頭像，為王權的象徵，髮式與容貌特徵均同於前述之貴霜赫勞斯王肖像與卡爾查延遺址王族塑像。祭壇右側的男子著燕尾短衣及長靴，應為祭司。博羅斯馬克指出這些刺繡中的十餘名男性，應屬於印度一斯基泰人或印度一安息人，但川崎建三與雅岑科認為應是貴霜人，蓋國王與拜火壇並列出現的母題常見於貴霜錢幣，但卻未見於印度一斯基泰人或印度一安息人錢幣母題，川崎建三甚

至推測此幅刺繡所描繪的或許是一個與異族盟誓之場景。³⁹

接下來是 20 號墓出土的毛織刺繡，該刺繡保存情況不甚理想，唯有中央部分較為完好，場景主要是一配長劍之男子坐於一椅凳之上，手持碗杯做啜飲狀。場景另有一著及膝長袍大衣之男子立於坐姿男子左側（圖 8），⁴⁰川崎建三將此圖名之為「國王酒宴圖」。⁴¹兩男髮式皆為剪髮，左側男子頭繫髮帶，與諾彥烏拉 25 號墓葬出土刺繡人像之髮型類似。二人皆高額蓄髭，鼻樑挺直。此織物之最左側尚有一殘缺之半面頭像，頭髮中分，髮色為黃色（金髮？），織物左方另一站立人像之頭髮則為紅棕色（圖 9）。⁴²西域古族在中古時期髮式多為剪髮，其中焉耆、悅般、波斯、嚙唃、⁴³且末⁴⁴等諸國都有剪髮習俗的記載，因之中國中古史料中所謂西域諸國的「剪髮」，其具體形象應該就是這些毛織刺繡中人像的髮式。

³⁹ 川崎建三，〈ノイン・ウラ古墳出土刺繡毛織考——新出資料の紹介を中心に——〉，頁 85-87。

⁴⁰ Gelegdorj Eregzen ed., *Treasures of the Xiongnu*, fig. 383; Natalia Polos'mak, Henri-Paul Francfort and Olga Tsepova, "Nouvelles découvertes de tentures polychromes brodées du début de notre ère dans les tumuli n° 20 et n° 31 de Noin-Ula (République de Mongolie)," p. 8, fig. 6.

⁴¹ 川崎建三，〈ノイン・ウラ古墳出土刺繡毛織考——新出資料の紹介を中心に——〉，頁 94。

⁴² Natalia Polos'mak, Henri-Paul Francfort and Olga Tsepova, "Nouvelles découvertes de tentures polychromes brodées du début de notre ère dans les tumuli n° 20 et n° 31 de Noin-Ula (République de Mongolie)," pp. 14-15, fig. 17, 18, 19.

⁴³ 北齊·魏收，《魏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 102，〈西域傳〉，頁 2265、2268、2271、2279。

⁴⁴ 唐·李延壽，《南史》（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 79，〈西域傳〉，頁 1986；唐·姚思廉，《梁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卷 54，〈西北諸戎傳〉，頁 8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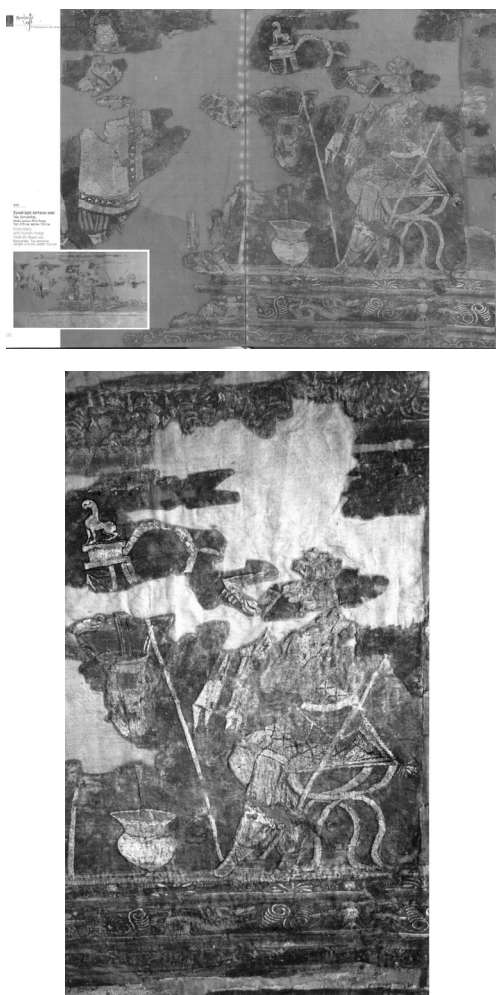


圖 8 諾彥烏拉 20 號墓出土之坐姿人物毛織刺繡

資料來源：Gelegdorj Eregzen ed., *Treasures of the Xiongnu*, fig. 383; Natalia Polos'mak, Henri-Paul Francfort and Olga Tsepova, "Nouvelles découvertes de tentures polychromes brodées du début de notre ère dans les tumuli n° 20 et n° 31 de Noin-Ula (République de Mongolie)," p. 8, fig. 6.



圖 9 諾彥烏拉 20 號墓毛織刺繡人像與赫勞斯（Heraus）王
肖像之比較

資料來源：Natalia Polos'mak, Henri-Paul Francfort and Olga Tsepova, "Nouvelles découvertes de tentures polychromes brodées du début de notre ère dans les tumuli n° 20 et n° 31 de Noin-Ula (République de Mongolie)," pp. 14-15, fig. 17, 18, 19.

至於人像容貌與衣裝之風格，博羅斯馬克認為男子之髮型為安息風格，大衣裝飾承襲自阿赫美尼德王朝以來的伊朗長袍大衣特徵。雅岑科則認為人物的髮型與衣著均未見於安息、粟特、花刺子模與印度—斯基泰諸族，此處表現的應是大夏地區大月氏族

的外型容貌。川崎建三發現人像頭部可觀察到反映中亞古代傳統的變形頭骨特徵，此種傳統在貴霜朝與其後的嚙嚙錢幣上皆可發現，也與卡爾查延遺址王族的外貌酷似，不能排除應與貴霜族有關的可能性。⁴⁵

20 號墓出土織物男子所坐的凳子為一種行軍折疊椅，與羅馬帝政時期的 S 型彎曲椅凳一樣，明顯是專為國王或神祇等高貴人物所使用，參照西元初期阿富汗黃金之丘（Tillya Tepe）墓葬中此種椅凳曾伴隨矢葭、箭等出土的發現，可能在游牧民族塞種之間，此種椅凳是一種身分階級的象徵，因此刺繡畫面中央的男子應為一國王。⁴⁶而男子手持半球圓錐形的杯子，此種同類型的杯子無論是黏土製、玻璃製或金屬製，自西元前二世紀希臘化時期起即普遍見於西起義大利東至印度之間的廣大地區。⁴⁷另外置於地上的大容器是一種餐桌酒杯，此類型的杯子是典型的羅馬銀杯，推測應是從地中海地區輸入的貿易品。此一國王飲酒的場景也可能是受到希臘酒神（Dionysos）信仰的影響，而在瑣羅亞斯德教的秋祭

⁴⁵ 川崎建三，〈ノイン・ウラ古墳出土刺繡毛織考——新出資料の紹介を中心に——〉，頁93-94。

⁴⁶ Natalia Polos'mak, Henri-Paul Francfort and Olga Tsepova, "Nouvelles découvertes de tentures polychromes brodées du début de notre ère dans les tumuli n° 20 et n° 31 de Noin-Ula (République de Mongolie)," p. 8; 川崎建三，〈ノイン・ウラ古墳出土刺繡毛織考——新出資料の紹介を中心に——〉，頁94-95。

⁴⁷ Natalia Polos'mak, Henri-Paul Francfort and Olga Tsepova, "Nouvelles découvertes de tentures polychromes brodées du début de notre ère dans les tumuli n° 20 et n° 31 de Noin-Ula (République de Mongolie)," p. 10.

(Mithrakana) 之中，也有酒與水結合的種種祭儀。川崎建三認為在希臘化時代，希臘的酒神信仰曾普及於中亞，因此出現了希臘神祇與當地信仰結合的現象。⁴⁸

四、匈奴考古中所見的西亞與希臘、羅馬元素

在 1940 年夏，蘇聯考古學家在南西伯利亞的塔舍巴(Tasheba)發現了一座有漢式建築風格的宮殿(阿巴坎 Abakan 宮殿)，這座宮殿曾被吉謝列夫(S. B. Kiselev)認為是李陵在丁零地區的住所，⁴⁹由於中國史籍曾記載李陵在投降匈奴後曾被封在此區，⁵⁰因此前蘇聯學者多贊同此宮殿當是匈奴為李陵所建。如科茲拉索夫(Leonid R. Kyzlasov)認為宮殿的建築年代始於西元前一世紀初期和前四分之一世紀，但不晚於西元前一世紀前半葉，符合匈奴人統治薩彥阿爾泰山地，以及匈奴駐紮在葉尼塞河谷地官員李陵的年代。他相信塔舍巴這座不同尋常的建築屬於漢朝將軍李陵，李陵在被

⁴⁸ 川崎建三，〈ノイン・ウラ古墳出土刺繡毛織考——新出資料の紹介を中心に——〉，頁96-98。

⁴⁹ 吉謝列夫在《南西伯利亞古代史》一書中將該建築名為「李陵宮」，但文中未對此做出論證。參見吉謝列夫(S. B. Kiselev)著、莫潤先譯，《南西伯利亞古代史》(烏魯木齊：新疆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1985)，頁79-81。

⁵⁰ 李陵降匈奴後被封為右校王，參見漢·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卷54，〈李廣蘇建傳〉，頁2457。有關此右校王，顏師古等歷代註釋家未做出解釋，郭沫若認為是右賢王，參見郭沫若，《蘇聯紀行》(北平：中外出版社，1946)，頁136；角田文衛也認為匈奴曾封李陵為右賢王且統治過堅昆地區，參見角田文衛，〈所謂『李陵の邸宅址』について〉，《古代學》，6：1(大阪，1957.4)，頁94。

俘後成為一位匈奴貴族並統治南西伯利亞地區。⁵¹但也有不同的意見，如周連寬便認為此宮殿實為王昭君長女須卜居次云的住所，⁵²另有人認為須卜居次云的丈夫右骨都侯須卜當，才是此座宮殿真正的主人，⁵³有關此宮殿主人問題的討論，可參考日本學者林俊雄的著作。⁵⁴

科茲拉索夫主張塔舍巴（阿巴坎）宮殿的牆壁應當是由西方工匠建造的，因為它們直接修建在地面上並用帕克薩（堅固層）建成，這是中亞的古老傳統。塔舍巴宮殿的屋頂沒有飛檐結構（斗拱），屋頂的椽子和平樑主要安放在帕克薩牆上，這種設計特徵也暗示實際上這座建築並不是由遠東傳統的追隨者建造的。很明顯，從選址、牆壁建造的方法和屋頂的固定方式等這些設計特徵，證明塔舍巴宮殿既不是中國人也不是匈奴人建造的，而是出自一

⁵¹ Leonid R. Kyzlasov, *The Urban Civilization of Northern and Innermost Asia. Historical and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București: Editura Academiei Române; Brăila: Editura Istros a Muzeului Brăilei, 2010), pp. 240-241, 244-245; 中譯本可參見列昂尼德·R·科茲拉索夫 (Leonid R. Kyzlasov) 著，薛樵風、成一農譯，《中北亞城市文明歷史學和考古學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9），頁263-264、268-269。

⁵² 周連寬，〈蘇聯南西伯利亞所發現的中國式宮殿遺址〉，《考古學報》，1956：4（北京，1956.12），頁63；最近孫家洲至南西伯利亞實地考察此宮殿後，亦贊同周連寬的意見，參見氏著，〈“最北方的漢式宮殿”與王昭君的女兒女婿〉，《文史天地》，2018：4（貴陽，2018.4），頁12-16。

⁵³ 張景明、馬宏濱，〈俄羅斯境內漠北匈奴地發現的漢式宮殿主人考釋〉，《北方民族大學學報》，2021：5（銀川，2021.9），頁105-109。

⁵⁴ 林俊雄，〈興亡の世界史第 02 卷スキタイと匈奴 遊牧の文明〉（東京：講談社，2007），頁306-310。

些新來的中亞工匠之手（可能還委派了一些本土的建造者）。他們是招募而來的戰俘，是在西元前211年至168年及隨後的匈奴向西征服月氏（貴霜 **Kushan**）的戰鬥中被俘，這可以解釋各種東亞和西亞建築傳統在塔舍巴宮殿設計中的融合。⁵⁵

科茲拉索夫指出塔舍巴宮殿的取暖設施既不見於古代中國，也不見於中亞的匈奴。遠東的炕是一種地上取暖系統，而不是像這處宮殿那樣位於地面以下，在建築地面下 30-35 厘米至 60 厘米處建造了煙道。這種地下供暖系統毫無疑問不是源於匈奴或是中國（甚至不是整個遠東）的，它突出的是西方建築文化的特徵，並被發現於西伯利亞迄今所知唯一一處匈奴人的宮殿裡。目前所知最早的這種類型供暖系統的例子是發現於伊師塔神廟（**Temple of Ishtar**）以及可以追溯至西元前十八世紀馬里（**Mari**）的蘇美人宮殿裡。在中哈薩克斯坦，發現了歐亞大陸北部最古老的配備地下供暖系統和石板覆蓋的管道住宅，它們的年代可早至青銅時代（西元前十五至十四世紀）的阿拉卡（**Alaka**）文化。塔舍巴宮殿的規劃與同時期及古代西伯利亞、中亞和遠東建築沒有直接的相似性，它的根源在西方，經由中亞、阿富汗和伊朗，它的建築可追溯至古代美索不達米亞和整個西亞。在塔舍巴多房間宅邸的設計和規劃中，流行著西亞和歐洲文化房屋建造技術建築的特殊特徵。因此，這座宮殿的建造者既不會是中國人，也不會是匈奴人，

⁵⁵ Leonid R. Kyzlasov, *The Urban Civilization of Northern and Innermost Asia. Historical and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p. 201, 203；列昂尼德·R·科茲拉索夫（Leonid R. Kyzlasov）著，薛樵風、成一農譯，《中北亞城市文明歷史學和考古學研究》，頁224、226。

或塔加爾的丁零人，或新遷來的鬲昆人（吉爾吉斯人）。很可能是某個來自中亞的傑出建造者，從被俘的月氏人中被帶到這裡。中國人把馬薩革特一貴霜人（Massageteans-Kushans）和他們龐大的國家稱做「月氏」。⁵⁶

值得注意的是塔舍巴宮殿曾出土過兩個人面鋪首，其形象皆為高鼻深目，有翹尖卷曲的長髭，頭上有兩角，雙鬢留有捲髮，鼻中穿一門環（圖 10）。⁵⁷吉謝列夫認為鋪首顯然表現了歐羅巴人種的特點，特別是高鼻子，表現的是自遠古時期至西元初在南西伯利亞占統治地位的寬臉歐羅巴人，證明此臉像是當地製造的。⁵⁸科茲拉索夫也認為這個神怪的形象在體質特徵上與生活在葉尼塞河中游的民族存在聯繫，一個可類比的例子是在一處蒙古匈奴遺址中出土的一枚無角形象黏土模具。這個守護神的形象被描繪成一張歐羅巴人臉龐的輪廓，有大眼睛和大鼻子。上面也有鬚髭、獠牙和黏貼上去模仿門環的陶環（圖 11）。⁵⁹

⁵⁶ Leonid R. Kyzlasov, *The Urban Civilization of Northern and Innermost Asia. Historical and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pp. 209-210, 215-216, 219, 222；列昂尼德·R·科茲拉索夫（Leonid R. Kyzlasov）著，薛樵風、成一農譯，《中北亞城市文明歷史學和考古學研究》，頁232-233、239、242、246。

⁵⁷ 吉謝列夫（S. B. Kiselev）著，莫潤先譯，《南西伯利亞古代史》，頁225，圖46；Leonid R. Kyzlasov, *The Urban Civilization of Northern and Innermost Asia. Historical and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pp. 225-226, fig. 36, 37.

⁵⁸ 吉謝列夫（S. B. Kiselev）著，莫潤先譯，《南西伯利亞古代史》，頁79-81。

⁵⁹ Leonid R. Kyzlasov, *The Urban Civilization of Northern and Innermost Asia. Historical and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p. 167, fig. 15, 227；列昂尼德·R·科茲拉索夫（Leonid R. Kyzlasov）著，薛樵風、成一農譯，《中北亞城市文明歷史學和考古學研究》，頁248、251。



圖 10 南西伯利亞塔舍巴（阿巴坎）宮殿出土之人面鋪首

資料來源：吉謝列夫 (S. B. Kiselev) 著、莫潤先譯，《南西伯利亞古代史》，頁225，
圖 46；Leonid R. Kyzlasov, *The Urban Civilization of Northern and Innermost Asia. Historical and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pp. 225-226, fig. 36, 37.



圖 11 蒙古匈奴遺址出土的黏土模具

資料來源：Leonid R. Kyzlasov, *The Urban Civilization of Northern and Innermost Asia. Historical and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p. 167, fig. 15

林梅村認為塔舍巴宮殿的雙角造型人面鋪首，其實就是希臘神話的森林之神薩提爾（Satyr）。⁶⁰類似的例子在南西伯利亞尚有查拉姆（Tsaram）匈奴遺址，查拉姆 M7 出土的帶扣，表現一個頭長兩角，口大張，八字鬚細長、末端向上卷起，髯濃密、卷曲的人面形象（圖 12），⁶¹毛織腰帶從人口中穿過，發掘者米尼亞耶夫

⁶⁰ 林梅村，〈烏禪幕東邊蒙古高原考——兼論匈奴文化對漢代藝術之影響〉，《歐亞學刊（國際版）》，新3輯（北京，2015.11），頁9。

⁶¹ S. S. Minyaev, "Tsaram: A Burial Ground of the Hsiung-nu Elite in Transbaikalia," *Archaeology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of Eurasia* 37: 2 (June, 2009), p. 57, fig. 17.

(S. S. Minyaev) 認為他是希臘羅馬神話中的薩提爾。⁶²馬健認為查拉姆M7 的這套帶具表現的是希臘、西亞神話的題材，很可能源於希臘化的安息帝國。⁶³與查拉姆造型類似的薩提爾神像帶扣，亦發現於南西伯利亞阿爾泰地區匈奴時期（西元前二世紀至西元一世紀）Bulan-Koba 文化的 Yaloman II 墓葬群。在雅隆曼 II 的 43 號庫爾干發現了兩個造型相似的黃金帶扣（圖 13），⁶⁴但 Tishkin 認為雅隆曼 II 黃金帶扣表現的是北高加索一帶的納特神話傳說（Nart Sagas）。⁶⁵

⁶² S. S. Minyaev, “Tsaram: A Burial Ground of the Hsiung-nu Elite in Transbaikalia,” p. 58; S. S. Minyaev & L. M. Sakharovskaia, “An Elite Complex of Xiongnu Burials in the Tsaram Valley,” *Anthropology & Archaeology of Eurasia*, 46: 4 (Spring, 2008), pp. 75, 83.

⁶³ 馬健，《匈奴葬儀的考古學探索——兼論歐亞草原東部文化交流》（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2011），頁318-319。

⁶⁴ Alexey A. Tishkin, “Altai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Xiongnu Empire,” in *Archaeology and Conservation along the Silk Road*, eds. Gabriela Krist & Liangren Zhang (張良仁) (Wien: Böhlau Verlag, 2018), p. 171, fig. 8.

⁶⁵ Alexey A. Tishkin, “Altai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Xiongnu Empire,” p. 171.



圖 12 查拉姆匈奴遺址出土的帶扣

資料來源：S. S. Minyaev, "Tsaram: A Burial Ground of the Hsiung-nu Elite in Transbaikalia," p. 57, fig. 17.



圖 13 雅隆曼 II 遺址發現的兩個黃金帶扣

資料來源：Alexey A. Tishkin, "Altai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Xiongnu Empire," p. 171, fig. 8.

另一個具有希臘文化因素的匈奴考古發現，是在諾彥烏拉 20 號墓葬中出土的一件銀製希臘式圓盤浮雕飾牌（圖 14），⁶⁶此圓盤被認為可能是來自地中海東部的小亞細亞⁶⁷或黑海的手工作坊，年代約在西元前二世紀晚期至一世紀前期。但其作用並非是作為軍事胸章，而是作為馬具的配飾。⁶⁸銀盤上雕刻有一男一女及一幼童，有論者認為描繪的是森林之神薩提爾與寧芙（Nymph），⁶⁹也有人認為是薩提爾與阿芙羅黛特⁷⁰或酒神身邊的女侍 Maenad。⁷¹但筆者認為不排除為海格力斯與翁法勒（Hercules and Omphale），蓋圓盤飾牌中之男子坐於一攤在地面的獸皮之上，該獸皮似為獅

⁶⁶ Ursula B. Brosseder, "A Study on the Complexity and Dynamics of Interaction and Exchange in Late Iron Age Eurasia," in *Complexity of Interaction along the Eurasian Steppe Zone in the first Millennium CE*, eds. Jan Bemann & Michael Schmauder (Bonn: Vor- und Frühgeschichtliche Archäologie, Rheinische Friedrich-Wilhelms-Universität, 2015), p. 262, fig. 29-1.

⁶⁷ Mikhail Treister, "On the Find of a Phalera Made from the Medallion of a Hellenistic Cup in Barrow No. 20 of the Noin-Ula Burial-Ground (Northern Mongolia)," *Ancient Civilizations from Scythia to Siberia* 22/1 (July, 2016), p. 76.

⁶⁸ Ursula B. Brosseder, "A Study on the Complexity and Dynamics of Interaction and Exchange in Late Iron Age Eurasia," p. 261.

⁶⁹ 林梅村，〈烏禪幕東邊蒙古高原考——兼論匈奴文化對漢代藝術之影響〉，頁 9；馬健，〈匈奴葬儀的考古學探索——兼論歐亞草原東部文化交流〉，頁 302。

⁷⁰ Bryan K. Miller & Ursula Brosseder, "Beasts of the North: Global and Local Dynamics as Seen in Horse Ornaments of the Steppe Elite," *Asian Archaeology*, 1 (August, 2013), p. 104.

⁷¹ Mikhail Treister, "On the Find of a Phalera Made from the Medallion of a Hellenistic Cup in Barrow No. 20 of the Noin-Ula Burial-Ground (Northern Mongolia)," p. 69, 74; William Honeychurch, "From Steppe Roads to Silk Roads: Inner Asian Nomads and Early Interregional Exchange," p. 64.

皮，而海格力斯的造形正經常與獅皮一同出現。⁷²

此圓盤浮雕的作用在諾彥烏拉 31 號墓葬中出土的刺繡中有可堪比對的例子，前章所述毛織物的群像人物中有一牽馬人像，其坐騎之胸帶上掛有一圓形盤狀物（圖 15），⁷³應即此類的圓盤。此種在馬胸帶上繫上圓盤的類似作法，亦可見於貴霜時代的卡爾查延遺址，從馬具表現的類同性來看，川崎建三認為諾彥烏拉毛織刺繡可能是製作於貴霜初期的大夏地區。⁷⁴

⁷² 據希臘神話的描述，海格力斯在殺死猛獅後將獅皮剝下做成頭盔，日後成為海格力斯造型的典型特徵。有關海格力斯的獵獅經過，參見古斯塔夫·施瓦布（Gustav Schwab）著、曹乃雲譯，《希臘古典神話》（南京：譯林出版社，2013），頁163、167-169。著獅皮頭盔的海格力斯形象，曾遠布傳至東方的印度與中國，參見邢義田，〈赫拉克利斯（Heracles）在東方——其形象在古代中亞、印度與中國造形藝術中的流播與變遷〉，文收蔡新江、李孝聰主編，《中外關係史：新史料與新問題》（北京：科學出版社，2004），頁15-47。

⁷³ Ursula B. Brosseder, "A Study on the Complexity and Dynamics of Interaction and Exchange in Late Iron Age Eurasia," p. 262, fig. 29-3; Bryan K. Miller & Ursula Brosseder, "Beasts of the North: Global and Local Dynamics as Seen in Horse Ornaments of the Steppe Elite," p. 99, fig. 6; Natalia Polos'mak, Henri-Paul Francfort and Olga Tsepova, "Nouvelles découvertes de tentures polychromes brodées du début de notre ère dans les tumuli n° 20 et n° 31 de Noin-Ula (République de Mongolie)," p. 19, fig. 27.

⁷⁴ 川崎建三，〈ノイン・ウラ古墳出土刺繡毛織考——新出資料の紹介を中心に——〉，頁78。



1

圖 14 諾彥烏拉 20 號墓葬出土的銀製圓盤浮雕飾牌

資料來源：Ursula B. Brosseder, "A Study on the Complexity and Dynamics of Interaction and Exchange in Late Iron Age Eurasia," p. 262, fig. 2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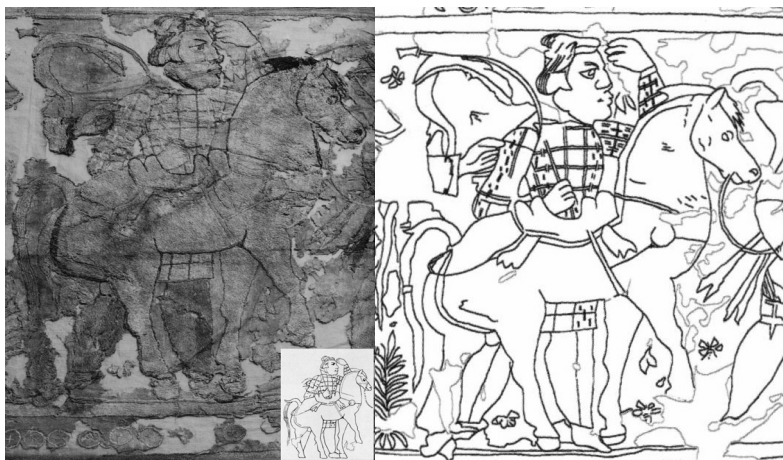


圖 15 諾彥烏拉 31 號墓葬出土刺繡馬匹胸帶的圓形盤狀物

資料來源：Ursula B. Brosseder, “A Study on the Complexity and Dynamics of Interaction and Exchange in Late Iron Age Eurasia,” p. 262, fig. 29-3; Bryan K. Miller & Ursula Brosseder, “Beasts of the North: Global and Local Dynamics as Seen in Horse Ornaments of the Steppe Elite,” p. 99, fig. 6; Natalia Polos’mak, Henri-Paul Francfort and Olga Tsepova, “Nouvelles découvertes de tentures polychromes brodées du début de notre ère dans les tumuli n° 20 et n° 31 de Noin-Ula (République de Mongolie),” p. 19, fig. 27.

另一個與希臘羅馬文化因素有關的考古發現是諾彥烏拉 M6 出土的一塊帷幔織物，織物紋樣中有一個小戰士的形象。此小戰士一手持盾，另一手握矛，似瞄準其右方的一隻鷹（圖 16）。⁷⁵魯金科認為從此題材畫面中不難找到其所具有的希臘藝術特徵，而

⁷⁵ Herwin Schaefer, “Hellenistic Textiles in Northern Mongolia,” p. 268, fig. 5；魯金科（S. I. Rudenko）著，孫危譯，《匈奴文化與諾彥烏拉巨冢》，頁235，圖版 67-3；梅原末治，《蒙古ノイン・ウラ發見の遺物》，頁71，圖50。

此處所說的希臘也包括黑海沿岸地區。⁷⁶尤堪注意者，小戰士一手持矛一手舉盾的姿勢，無疑是希臘羅馬藝術的傳統形式，特別是羅馬藝術因素。一個可以提供比對的例子是1995年新疆營盤所出土的一件罽袍，⁷⁷此件罽袍上飾有人物及動物形象，其中即有裸體孩童一手持矛一手舉盾的圖像（圖17）。⁷⁸斯圖爾特（Peter Stewart）認為這些圖案不免讓人想起羅馬藝術中丘彼特以角鬥士身份戰鬥的畫面，而丘彼特通常在羅馬喪葬藝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指出：雖然羅馬藝術本身即是希臘化世界文化遺產的一部分，羅馬藝術也是由希臘的風格與圖像傳統塑造而成，但羅馬本身作為古典圖像傳播故事的一部分卻經常被人們忽略，我們視之為「希臘的」其實通常是羅馬帝國的遺產。所以也許有時候，這種圖像應當看作西元初的幾個世紀裡羅馬在地中海和中東地區繼承、發揚、培養和傳播的一種全球性的、國際化視覺語言。⁷⁹其實Herwin Schaefer 早已提出諾彥烏拉的織物風格是當時羅馬帝國普遍流行

⁷⁶ 魯金科（S. I. Rudenko）著，孫危譯，《匈奴文化與諾彥烏拉巨冢》，頁124、126。

⁷⁷ 考古簡報認為墓主是一位來自西方的貿易富商，參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尉犁縣營盤墓地 15 號墓發掘簡報〉，《文物》，1999：1（北京，1999.1），頁15；雅岑科認為墓主是來自貴霜的商人，參見 Sergey A. Yatsenko, “Yuezhi on Bactrian Embroidery from Textiles Found at Noyon uul, Mongolia,” p. 46.

⁷⁸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尉犁縣營盤墓地 15 號墓發掘簡報〉，頁10，圖10；彼得·斯圖爾特（Peter Stewart）著、王坤霞譯，〈從營盤到犍陀羅——絲路希臘化藝術遺產中的“羅馬”因素〉，《西域研究》，2019：3（烏魯木齊，2019.7），圖2。

⁷⁹ 彼得·斯圖爾特（Peter Stewart）著、王坤霞譯，〈從營盤到犍陀羅——絲路希臘化藝術遺產中的“羅馬”因素〉，頁51、54-55。

的樣式，儘管其原型是源自於希臘化風格。⁸⁰因此若以此種觀點來看，匈奴考古中所出土這些毛織物圖像所呈現的文化因素，也應納入羅馬帝國的藝術成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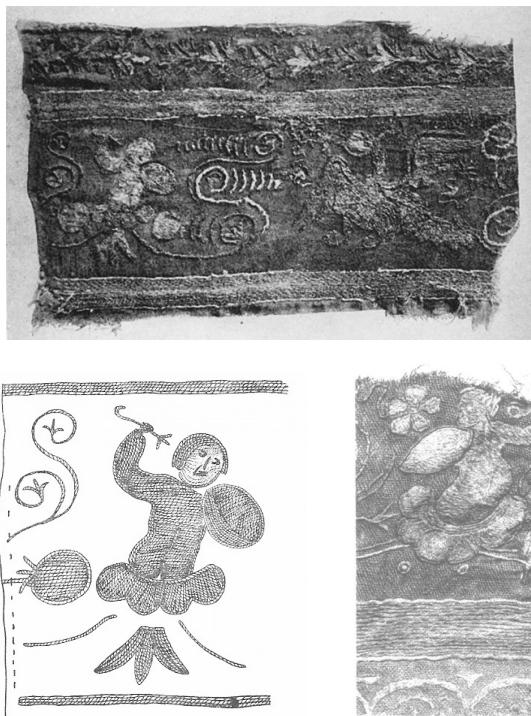


圖 16 諾彥烏拉 M6 出土帷幔織物上的小戰士

資料來源：Herwin Schaefer, "Hellenistic Textiles in Northern Mongolia," p. 268, fig. 5；魯金科 (S. I. Rudenko) 著，孫危譯，《匈奴文化與諾彥烏拉巨冢》，頁235，圖版67-3；梅原末治，《蒙古ノイン・ウラ發見の遺物》，頁71，圖50。

⁸⁰ Herwin Schaefer, "Hellenistic Textiles in Northern Mongolia," p. 277.



圖 17 新疆營盤所出土罽袍上的孩童持矛舉盾圖像

資料來源：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尉犁縣營盤墓地15號墓發掘簡報〉，頁10，圖10；彼得·斯圖爾特（Peter Stewart）著、王坤霞譯，〈從營盤到犍陀羅——絲路希臘化藝術遺產中的“羅馬”因素〉，圖2。

無論如何，上述之考古出土物在風格、母題上皆與希臘神話有關，學界普遍是持肯定態度的，它們極可能是製作於希臘化地區的某處，再藉由貿易或朝貢等途徑輸入到蒙古匈奴本部，而成為匈奴貴族的裝飾品，最後隨葬到墓葬之中。因之可以發現匈奴與中亞、伊朗甚至西方的希臘羅馬世界一直都存在著聯繫，這是我們在觀察匈奴歷史文化時不應忽視的一點。

五、從匈奴考古重新審視月氏與匈奴間的關係

從匈奴墓葬所出土毛織物的中亞貴霜風格來看，似乎可以讓學界重新審視月氏與匈奴間的密切關係。在匈奴尚未崛起之前，匈奴應僅是從屬於月氏的一個游牧勢力，而月氏可能即是活躍於南西伯利亞阿爾泰一帶的斯基泰人。在戰國時代，月氏的勢力可能曾擴張至包含現今新疆、甘肅一帶的中國西北地區，甚至往東延伸至鄂爾多斯一帶，⁸¹而匈奴當時才剛從中國北方的草原地帶正要崛起。《史記》載明在冒頓父親頭曼單于之時，當時北亞蒙古草原的局勢是「東胡彊而月氏盛」，⁸²冒頓甚至一度被頭曼送至月氏當質子，直至冒頓擊敗月氏並迫使其勢力退出蒙古高原後，匈奴才取得北亞游牧霸權的地位。後來冒頓又繼續降服匈奴北方南西伯利亞一帶的渾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犁諸國，至此將月氏勢力一舉逐出南西伯利亞。至漢文帝時，匈奴再度令右賢王發動對月氏的攻擊，這次襲擊徹底擊潰月氏在東部歐亞草原的基業，《史記》形容是「夷滅月氏，盡斬殺降下之。定樓蘭、烏孫、呼

⁸¹ Gustav Haloun(霍古達), "Zur Üe-tsi-Frage," *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 Band. 91: 2 (1937), pp. 304-318; Enoki Kazuo (榎一雄), "The Yuch-Scythian Identity, a Hypothesis," in *Studia Asiatica: the collected papers in Western languages of the late Dr. Kazuo Enoki* (Tokyo: Kyuko Shoin, 1998), pp. 26-27; K. Enoki, G. A. Koshelenko and Z. Haidary, "The Yüeh-chih and their Migrations," in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 Vol. II*, ed. János. Harmatta (Paris: UNESCO Publishing, 1994), pp. 175-176.

⁸² 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卷110，〈匈奴列傳〉，頁2887。

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以為匈奴」。⁸³匈奴這次的軍事行動不但一舉擊垮月氏，還順帶征服了現今新疆地區的西域國家，可說完全取代了月氏原先在當地的統治地位。月氏自此將主力部眾撤往中亞以避其鋒，先遷徙至伊犁河流域，繼之又再度南遷至阿姆河與錫爾河之間的河中地區，此後將部族重心逐漸移往大夏一帶，此部分的月氏人被中國史籍稱為「大月氏」。除部分未遷徙的「小月氏」人選擇與羌人結盟而退守青藏高原北緣之外，月氏基本上已退出歐亞草原東部的歷史舞臺。其後月氏內部與當地早先到達的塞種部落之間又再度進行權力爭奪，隨後有所謂月氏「五翕侯」的出現，最後由貴霜翕侯脫穎而出締造了貴霜帝國。⁸⁴

其實匈奴在崛起之初，可能因長期役屬月氏之故，匈奴在族群與文化上皆吸收了許多來自月氏的影響。如白桂思（C. I. Beckwith）即提出也許匈奴最初曾一度為游牧伊朗人所役使，因此從他們身上習得了不少游牧伊朗人的文化因素，甚或自匈奴崛起之初，部分伊朗人塞種部落就是匈奴重要的組成份子。⁸⁵月氏應是

⁸³ 漢·司馬遷，《史記》，卷110，〈匈奴列傳〉，頁2896。

⁸⁴ 有關此段歷程歷史記載不明，有謂建立貴霜者實非原先的大月氏，而是原先早一步進佔該區的塞種部落；但也有堅持貴霜建立者仍是來自中國西北的月氏人之說。對此，可參見余太山，《貴霜史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頁5-19；傅鶴里（Harry Falk）撰、慶昭蓉譯，〈月氏五翕侯〉，文收朱玉麒主編，《西域文史》，第14輯（北京：科學出版社，2020），頁123-182。

⁸⁵ C. I. Beckwith, *Empires of the Silk Road: A History of Central Eurasia from the Bronze Age to the Pres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72-73.

原先主宰南西伯利亞阿爾泰一帶的斯基泰或塞種部落，⁸⁶而斯基泰-塞種是操伊朗語的所謂游牧伊朗人（Iranian Nomads）。⁸⁷在匈奴部落之中，不但存有斯基泰部落，同時也深受伊朗文化的影響，此點岑仲勉先生早有發覆。⁸⁸而匈奴人的臉上刺青習俗，疑似就是來自伊朗文化的浸染所致。⁸⁹近來基因學與語言學等跨學科的研究更表明在早期匈奴聯盟中，應存在著某種程度東伊朗人（斯基泰—塞種）成分的底層，說明匈奴是個混合東西方族群的複合游牧部落聯盟。⁹⁰因此匈奴雖然擊敗月氏並將之逐出歐亞草原東部，但鑑於匈奴與游牧伊朗人之間早期的密切關係，二者之間應仍存在著許多直接或間接的接觸管道。

魯金科已指出，匈奴與月氏、烏孫、粟特以及安息等民族之間都或多或少地保持著聯繫，如果說中國方面的史料中對此沒有

⁸⁶ Enoki Kazuo (榎一雄), "The Yuch-Scythian Identity, a Hypothesis," pp. 28-29; K. Enoki, G. A. Koshelenko and Z. Haidary, "The Yüeh-chih and their Migrations," pp. 177-178; D·策溫道爾吉 (Tseveendorja) 等著，潘玲等譯，《蒙古考古》（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頁102。

⁸⁷ A. Abetekov and H. Yusupov, "Ancient Iranian Nomads in Western Central Asia," in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 Vol. II*, ed. János. Harmatta (Paris: UNESCO Publishing, 1994), pp. 23-33.

⁸⁸ 岑仲勉，〈伊蘭之胡與匈奴之胡〉，文收林幹主編，《匈奴史論文選集》（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29-36。該文原載《真理雜誌》，1：3（重慶，1944），頁309-314。

⁸⁹ 陳健文，〈漢代胡人的文面圖樣及其與內陸歐亞之關係〉，《臺灣師大歷史學報》，46（臺北，2011.12），頁35-76。

⁹⁰ Alexander Savelyev and Choongwon Jeong, "Early nomads of the Eastern Steppe and their tentative connections in the West," pp. 4-7, 12.

一點涉及，那只是因為中國人對於這些資料的興趣不大。有一段時間粟特還處於匈奴的控制之下，因為來自中國的絲綢要由粟特商人運往大夏地區，再從那裡轉運到安息以及更遠的西方。另外當時的奢侈品也通過這條商路從西方輸入到東方，其中就有非常貴重的毛織物，諾彥烏拉巨冢中出土的這類遺物即為證據。帷幔上的肖像畫，很有可能是月氏人或烏孫人製造的，或者是大夏、安息工匠的作品。⁹¹雅岑科亦認為當張騫剛抵達河中地區（Transoxiana）之初，在此覓得新家園的月氏人仍畏懼匈奴而向其納貢，⁹²而這正是張騫在大月氏雖待了一年多，卻仍「不能得月氏要領」的關鍵因素。⁹³

匈奴一舉擊敗原先歐亞草原東部的最大強權月氏，給中亞的諸多斯基泰—塞種游牧伊朗人部落帶來震撼，因此西域諸國皆不敢得罪匈奴。以致儘管張騫有著超乎常人的外交手腕，⁹⁴但大月氏也好，烏孫也好，依然不敢立即與漢朝建立結盟關係，僅能先持觀望態度與漢朝嘗試交往。《史記·大宛列傳》云張騫到達烏孫之後，烏孫「素服匈奴日久，且又近之，其大臣皆畏胡，不欲移徙，

⁹¹ 魯金科（S. I. Rudenko）著，孫危譯，《匈奴文化與諾彥烏拉巨冢》，頁114-115、126。

⁹² Sergey A. Yatsenko, "Yuezhi on Bactrian Embroidery from Textiles Found at Noyon uul, Mongolia," p. 45.

⁹³ 漢·司馬遷，《史記》，卷123，〈大宛列傳〉，頁3158。

⁹⁴ 漢·司馬遷，《史記·大宛列傳》形容張騫的外交手腕在中亞留下相當高的評價，「其後使往者稱博望侯，以為質於外國，外國由此信之」。漢·司馬遷，《史記》，卷123，〈大宛列傳〉，頁3169。

王不能專制。騫不得其要領」。⁹⁵烏孫的情況應能說明大月氏最終不敢與漢朝結盟的原因，張騫說大月氏是因「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漢，殊無報胡之心」而放棄與漢結盟，⁹⁶應是一種在武帝面前欲維持漢朝顏面的表面說法，畏懼匈奴強大的國力才是中亞諸國不敢與漢朝聯盟的真正原因。

因此匈奴墓葬中所出土的大夏或是安息毛織刺繡，說明了匈奴透過朝貢關係掌控中亞大月氏等游牧伊朗人部落的實際情況，這些刺繡或許正如前述雅岑科所點明的，是透過納貢而被運抵蒙古草原，因而成為匈奴貴族日常所使用的奢侈品。不過我們也不能排除這些毛織刺繡是單純的東西方貿易交流下的產物。魯金科點出「絲綢之路」大約是在西元前一世紀後正式開通，從中國向西先後經過哈密、吐魯番和烏魯木齊，然後經過伊塞克湖到達費爾干納、粟特和大夏，接著又經過謀夫、哈馬丹直達楚拉——格拉尼克、帕爾米拉，最後從這裡再向西繼續前進。這條道路就是俗稱的「北道」，通過這條道路可以將小亞細亞地區和希臘的織物輸送到匈奴。因之可以假設，希臘的織物也可以經由黑海北岸的斯基泰部落被送到匈奴統治的地區。⁹⁷所以小亞細亞、安息以及大夏地區的織物之所以出現在匈奴統治的地區，亦有可能是透過貿易的形式，從遙遠的西方被運送到匈奴統治的東部歐亞草原。

⁹⁵ 漢·司馬遷，《史記》，卷123，〈大宛列傳〉，頁3169。

⁹⁶ 漢·司馬遷，《史記》，卷123，〈大宛列傳〉，頁3158。

⁹⁷ 魯金科（S. I. Rudenko）著，孫危譯，《匈奴文化與諾彥烏拉巨冢》，頁128-129、135。

六、結論

透過匈奴考古的發現，我們可以得知匈奴除了因與漢朝競爭而有頻繁的互動之外，同時也與西域保持著緊密的往來。透過此種與西域游牧伊朗人國家如大月氏貴霜、安息의 交往，匈奴取得了不少來自中亞、西亞甚至歐洲希臘羅馬文化的物品。無論是作為貢品或單純的貿易商品，可以得知至少自匈奴時代以來，以蒙古為核心的東部歐亞草原一直與其西方的中亞或希臘化世界持續維持著交往，也將東西方的物品透過此種互動關係傳播到歐亞大陸的東西兩端，這是草原世界自古以來一項獨特的歷史特質，即「貿易與征服」是游牧民族的一體兩面。⁹⁸而匈奴最終選擇朝中亞一帶移動西遷，也說明了匈奴民族與中亞之間長期以來的密切關係。所以匈奴族群與中亞，特別是伊朗文化的關連性，是我們在考察匈奴歷史時絕對不能忽視的一個重要面向。

⁹⁸ 譬如 Emma Bunker 曾將其編輯的一本圖錄命名為 *Traders and Raiders on China's Northern Frontier*，參見氏著 Emma C. Bunker & Jeny F. So, *Traders and Raiders on China's Northern Frontier* (Seattle and London: Arthur M. Gallery,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5).

徵引書目

一、文獻資料

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

漢·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

北齊·魏收，《魏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

唐·李延壽，《南史》，北京：中華書局，1975。

唐·姚思廉，《梁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

二、近人專書

D·策溫道爾吉（Tseveendorja）等著，潘玲等譯，《蒙古考古》，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古斯塔夫·施瓦布（Gustav Schwab）著，曹乃雲譯，《希臘古典神話》，南京：譯林出版社，2013。

列昂尼德·R·科茲拉索夫（Leonid R. Kyzlasov）著，薛樵風、成一農譯，《中北亞城市文明歷史學和考古學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9。

吉謝列夫（S. B. Kiselev）著，莫潤先譯，《南西伯利亞古代史》，烏魯木齊：新疆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1985。

余太山，《貴霜史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

馬健，《匈奴葬儀的考古學探索——兼論歐亞草原東部文化交流》，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2011。

郭沫若，《蘇聯紀行》，北平：中外出版社，1946。

普·巴·科諾瓦洛夫（P. B. Kononov）等著，陳弘法譯，《蒙古高原考古研究》，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16。

馮恩學，《俄國東西伯利亞與遠東考古》，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2002。

潘玲，《伊沃爾加城址和墓地及相關匈奴考古問題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07。

角田文衛編，《世界考古學大系・第九卷 北方ユーラシア・中央アジア》，東京：平凡社，1963。

林俊雄，《興亡の世界史・第二卷 スキタイと匈奴遊牧の文明》，東京：講談社，2007。

梅原末治，《蒙古ノイン・ウラ發見の遺物》，京都：便利堂，1960。

魯金科（S. I. Rudenko）著，孫危譯，《匈奴文化與諾彥烏拉巨冢》，北京：中華書局，2012。

Beckwith, Christopher I. *Empires of the Silk Road: A History of Central Eurasia from the Bronze Age to the Pres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Brosseder, Ursula and Miller, Bryan K, eds. *Xiongnu Archaeology-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f the First Steppe Empire in Inner Asia*. Bonn: Vor-und Frühgeschichtliche Archäologie, Rheinische Friedrich-Wilhelms-Universität, 2011.

- Bunker, Emma C. and So, Jeny F. *Traders and Raiders on China's Northern Frontier*. Seattle and London: Arthur M. Gallery,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5.
- Eregzen, Gelegdorj, ed. *Treasures of the Xiongnu. Ulaanbaatar: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Ulaanbaatar: Mongolian Academy of sciences, 2011.
- Kyzlasov, Leonid R. *The Urban Civilization of Northern and Innermost Asia. Historical and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Bucureşti: Editura Academiei Române; Brăila: Editura Istros a Muzeului Brăilei, 2010.
- Murphy, Eileen M. *Iron Age Archaeology and Trauma from Aymyrlyg, South Siberia*. Oxford: Basingstoke Press, 2003.
- Rostovtzeff, M. *The Animal Style in South Russia and Chin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29.
- Trever, Camilla. *Excavations in Northern Mongolia (1924-1925)*. Leningrad: J. Fedorov Printing House, 1932.

三、近人論文

- 安緯 (Guilhem André)、奚芷芳 (Holotová-Szinec Juliana),〈蒙古匈奴貴族墓地初步研究〉,《考古學報》,2009: 1,北京,2009.1,頁 69-92。
- 米尼亞耶夫 (Miniaev) 撰、畢波譯,〈匈奴考古〉,《新疆文物》,2003: 2,烏魯木齊,2003.9,頁 106-118

岑仲勉，〈伊蘭之胡與匈奴之胡〉，收入林幹主編，《匈奴史論文選集》，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 29-36。

邢義田，〈赫拉克利斯（Heracles）在東方——其形象在古代中亞、印度與中國造形藝術中的流播與變遷〉，收入榮新江、李孝聰主編，《中外關係史：新史料與新問題》，北京：科學出版社，2004，頁 15-47。

周連寬，〈蘇聯南西伯利亞所發現的中國式宮殿遺址〉，《考古學報》，1956：4，北京，1956.12，頁 55-66。

彼得·斯圖爾特（Peter Stewart）著、王坤霞譯，〈從營盤到犍陀羅——絲路希臘化藝術遺產中的“羅馬”因素〉，《西域研究》，2019：3，烏魯木齊，2019.7，頁 48-59、頁 156-157。

林梅村，〈烏禪幕東遷蒙古高原考——兼論匈奴文化對漢代藝術之影響〉，《歐亞學刊（國際版）》，新3輯，北京，2015.11，頁 1-13、圖版 1-10。

林幹，〈匈奴城鎮和廟宇遺跡〉，收入林幹編，《匈奴史論文選集》，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 413-429。

林幹，〈匈奴墓葬簡介〉，收入林幹編，《匈奴史論文選集》，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 375-412。

娜塔莉亞·博羅斯馬克（Natalia V. Polos'mak），〈諾音烏拉古冢發掘新收穫：中亞游牧人群的隱秘生活〉，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等主編，《第二屆世界考古論壇會志》，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頁 102-111。

孫家洲，〈“最北方的漢式宮殿”與王昭君的女兒女婿〉，《文史天地》，2018：4，貴陽，2018.4，頁 12-16。

張景明、馬宏濱，〈俄羅斯境內漠北匈奴地發現的漢式宮殿主人考釋〉，《北方民族大學學報》，2021：5，銀川，2021.9，頁 105-109。

陳健文，〈漢代胡人的文面圖樣及其與內陸歐亞之關係〉，《臺灣師大歷史學報》，46，臺北，2011.12，頁 35-76。

雪蓮，〈匈奴考古研究在蒙古國——以 20 世紀匈奴考古為例〉，《西部蒙古論壇》，2011：3，烏魯木齊，2011.8，頁 60-63、頁 127。

傅鶴里（Harry Falk）撰、慶昭蓉譯，〈月氏五翕侯〉，收入朱玉麒主編，《西域文史》，第 14 輯，北京：科學出版社，2020，頁 123-182。

單月英，〈匈奴墓葬研究〉，《考古學報》，2009：1，北京，2009.1，頁 35-68。

策·圖爾巴圖，〈蒙古地區匈奴城址研究〉，收入魏堅、呂學明主編，《東北亞古代聚落與城市考古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14，頁 181-190。

策·圖爾巴圖、薩仁畢力格，〈蒙古國境內匈奴墓葬研究概況及近年新發現〉，《草原文物》，2011：1，呼和浩特，2011.3，頁 65-74、頁 123-124。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尉犁縣營盤墓地 15 號墓發掘簡報〉，《文物》，1999：1，北京，1999.1，頁 4-16。

韓康信，〈塞、烏孫、匈奴和突厥之種族人類學特徵〉，《西域研究》，1992：2，烏魯木齊，1992.6，頁 3-23。

Hayashi Toshio，〈Agriculture and settlements in the Hsiung-nu〉，《古代オリエント博物館紀要》，第 6 卷，東京，1984，頁 51-92。

S. I. Rudenko 著，加藤九祚譯，〈匈奴と他の諸民族の關係〉，《季刊ユーラシア》，3，東京，1971.12，頁 25-41。

И. Должислен著，志賀和子譯，〈『北匈奴』(1) - (5)〉，《古代學研究》，117-121 號，大阪，1988-1990，頁 1-12、頁 20-34、頁 26-42、頁 20-30、頁 45-57。

川崎建三，〈ノイン・ウラ古墳出土刺繡毛織考——新出資料の紹介を中心に——〉，《佛教藝術》，340，東京，2015.5，頁 78-106。

臼杵勲，〈モンゴルの匈奴墓〉，收入奈良国立文化財研究所創立 40 周年記念論文集刊行會編，《奈良国立文化財研究所創立 40 周年記念論文集 文化財論叢Ⅱ》，京都：同朋舎出版，1995，頁 773-793。

角田文衛，〈所謂『李陵の邸宅址』について〉，《古代學》，6：1，大阪，1957.4，頁 87-95。

Abetkov, A. and Yusupov, H. "Ancient Iranian Nomads in Western Central Asia." In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 Vol. II, edited by János. Harmatta, pp. 24-34. Paris: UNESCO Publishing, 1994.

- Brosseder, Ursula B. "A Study on the Complexity and Dynamics of Interaction and Exchange in Late Iron Age Eurasia" In *Complexity of Interaction along the Eurasian Steppe Zone in the first Millennium CE*, edited by Jan Bemann & Michael Schmauder, pp.199-332. Bonn: Vor-und Frühgeschichtliche Archäologie, Rheinische Friedrich-Wilhelms-Universität, 2015.
- Enoki K., Koshelenko, G. A. and Haidary, Z. "The Yüeh-chih and their Migrations." In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 Vol II*, edited by János Harmatta, pp. 171-191. Paris: UNESCO Publishing, 1994.
- Enoki Kazuo. "The Yuch-Scythian Identity, a Hypothesis." In *Studia Asiatica: the collected papers in Western languages of the late Dr. Kazuo Enoki*, pp. 22-29. Tokyo: Kyuko Shoin, 1998.
- Haloun Gustav. "Zur Üe-tsï-Frage." *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 Band*. 91: 2 (1937), pp. 243-318.
- Honeychurch, William. "From Steppe Roads to Silk Roads: Inner Asian Nomads and Early Interregional Exchange," In *Nomads as Agents of Cultural Change: The Mongols and Their Eurasian Predecessors*, edited by R. Amitai & M. Biran, pp. 50-87.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5.
- Miller, Bryan K. & Brosseder, Ursula. "Beasts of the North: Global and Local Dynamics as Seen in Horse Ornaments of the Steppe

Elite.” *Asian Archaeology*, 1 (August, 2013), p. 94-112.

Minyaev, S. S. & Sakharovskaia, L. M. “An Elite Complex of Xiongnu Burials in the Tsaram Valley.” *Anthropology & Archaeology of Eurasia*, 46: 4 (Spring, 2008), pp. 71-84.

Minyaev, S. S. “Tsaram: A Burial Ground of the Hsiung-nu Elite in Transbaikalia.” *Archaeology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of Eurasia*, 37: 2 (June, 2009), pp. 49-58.

Polos'mak Natalia, Francfort Henri-Paul and Tsepova Olga.
“Nouvelles découvertes de tentures polychromes brodées du début de notre ère dans les tumuli n° 20 et n° 31 de Noin-Ula (République de Mongolie).” *Arts Asiatiques*, 70 (November, 2015), pp. 3-32.

Savelyev, Alexander & Jeong, Choongwon, “Early nomads of the Eastern Steppe and their tentative connections in the West.” *Evolutionary Human Sciences* 2, 20 (May, 2020), pp. 1-17.

Schaefer, Herwin. “Hellenistic Textiles in Northern Mongolia.” *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47: 3 (July-September, 1943), pp. 266-277.

Tishkin Alexey A. “Altai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Xiongnu Empire.” In *Archaeology and Conservation along the Silk Road*, edited by Gabriela Krist & Liangren Zhang, pp. 157-190. Wien: Böhlau Verlag, 2018.

- Treister, Mikhail. "On the Find of a Phalera Made from the Medallion of a Hellenistic Cup in Barrow No. 20 of the Noin-Ula Burial-Ground (Northern Mongolia)." *Ancient Civilizations from Scythia to Siberia*, 22: 1 (July, 2016), pp. 55-95.
- Yatsenko, Sergey A. "Yuezhi on Bactrian Embroidery from Textiles Found at Noyon uul, Mongolia." *The Silk Road*, 10 (2012), pp. 39-48.
- Yetts, W. Perceval. "Links between Ancient China and the West." *Geographical Review*, 16: 4 (October, 1926), pp. 614-622.
- Yu. S. Khudyakov. "Problems of the Genesis of Culture of the Hunnic Period in the Altai Mountains." *Ancient Civilizations from Scythia to Siberia*, 3: 2-3 (January, 1997), pp. 329-346.
- Yu. S. Khudyakov. "Reconstruction of Female Costume Among the Nomads of the Hun Period in the Altai Mountains." *Ancient Civilizations from Scythia to Siberia*, 7: 1-2 (January, 2001), pp. 55-69.